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述评（1996-2008）

何艳玲*

【摘　要】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行政学在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本土化与规范化问题，这一双重困境使行政学发展隐含着一定程度的身份危机，而建立“中国的”行政学（即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标准的行政学）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对于如何解决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身份危机，已有的反思工作在对策研究还是问题研究、经验研究还是非经验研究、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从我国行政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指向真实行政实践的行政学经验研究的积累非常重要。

一、反思的开始：发展背后的忧思

本文旨在对近年来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工作进行综述和评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反思。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工作的梳理，有利于促进反思者之间的对话，并以此促进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先简要回顾一下我国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张成福，1996；张梦中、马克·霍哲2001）。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180 -181）。自此，中国社会科学开始全面恢复发展。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此文引起了人们对行政学的广泛关注。1982年、1983年，中国政治学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行政学讲习班，开始大力倡导行政学研究。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当时的劳动人事部召开了行政管理科学研讨会。1984年底，中国行政管理学会①筹备组成立。1985年，《中国行政管理》创刊。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此后在整个1990年代，行政学得到跨越式发展并成为热门专业，学界也逐渐提出了“建

---

*何艳玲：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08CSH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6JC80006）和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08JJD840194）。

① 在学科意义上，本文将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行政科学）与行政管理学等同。其基本渊源是：1982年，夏书章教授所用的词是行政学，以对应于西方语境中的“Public Administration”；到了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召开了行政管理科学研讨会，同年底，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在京成立。同年出版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初探》一书，正式提出了“行政管理学”这一名词，此书同时也载有他的《关于开展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一些粗浅认识》一文。此后，夏书章教授主编的教材大多用《行政管理学》作为书名。1985年，国家教委批准在全国一些高校设置第一批行政管理学专业。可是，一些学者对“行政管理学”一直有看法。其主要原因在于，“管理”在英文语境中更准确的对应是“management”，而将“Public Administration”翻译成行政管理，有混淆政府行政与私人管理之嫌。夏书章教授于1985年推出由他主编的《行政管理学》时，黄达强教授也随后出版了《行政学》教材。当“行政管理学”专业在一些高校开办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也在一些高校开办了（张成福，1996；张梦中、马克•霍哲，2001）。

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这一命题。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行政学学科的快速发展，针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从现有文献来看，较早进行专门讨论的是张成福于1996年发表的《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该文的基本观点是，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中国行政学者不够敏感……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我国目前的公共行政学教育（特别是高级学位教育）中，几乎很少看到涉及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课程”（张成福，1996：60）。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我国行政学在理论建构以及理论指导现实世界的能力两个方面都表现欠佳。在行政学飞速发展的同时，该文富有洞见地提出了我国行政学研究在方法上的问题。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由此徐徐拉开，并在2007年达到高峰。

二、反思的历程：从“星星之火”到“局部共识”

首先有必要整理自1996年以来关于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主要文献；然后，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类处理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对这些研究进行阶段划分，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基本脉络。

（一）反思工作的基本情况

基于文献收集的原因，本文主要围绕公开发表的论文进行讨论，非公开发表的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不列入其中。总体来看，这些年来的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具有如下特点：

1.反思成果发表呈现断续交替现象。即，有的年份发表论文较多，有的年份则几乎没有任何成果。从图1看出，2007年是一个显著的高峰期，在这一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13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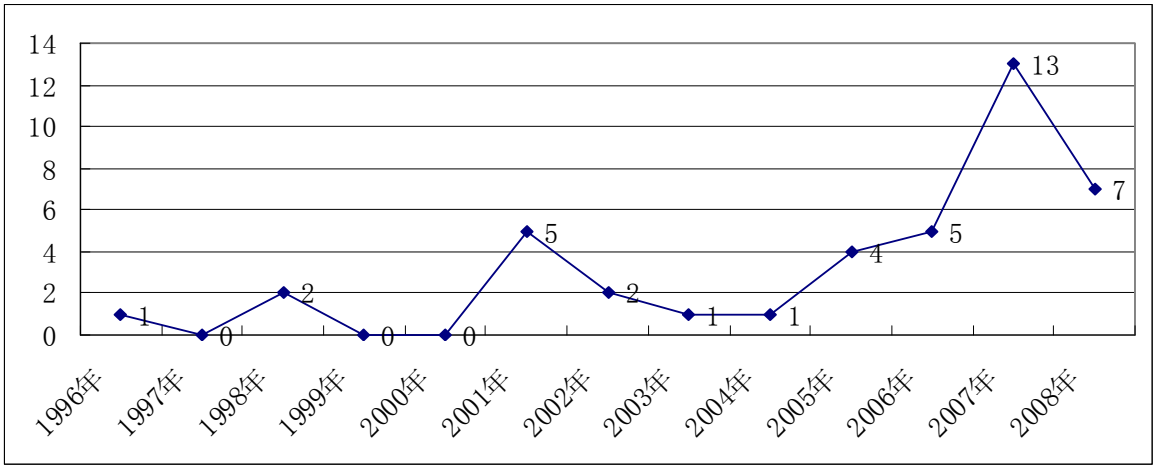


图1 历年行政学研究反思论文数量（1996-2008）

2.我国行政学研究的两种主要学术期刊，即《政治学研究》与《中国行政管理》在反思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1996年张成福的《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即发表在《政治学研究》当年第1期，而正是这篇论文揭开了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序幕；在所有反思工作的文献（共计41篇）中，有9篇来自《中国行政管理》，可见它所占比重非常高。2001年，《中国行政管理》开辟了“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显示出该刊对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最早认识。

3.反思工作最早由行政学界一些知名学者推动，并慢慢形成共识。比如在反思工作早期，就有张成福、郭济、薄贵利、高小平等人纷纷撰文，后来张康之、乔耀章、马骏等人陆续参与其中。随后，一批年轻学者也开始加入。

4.参与反思讨论的研究者涵盖面广泛。所有反思成果涉及的作者总计有31位，他们分别来自13家机构，且涵盖了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的所有学术职称。其中，有多位作者撰文超过2篇，显示了他们较高的参与程度。在这13家机构中，有两所机构的参与讨论者明显较多，一所是中山大学，有9位作者计14篇论文来自该校；另一所是中国人民大学，计有6篇论文来自该校。

（二）反思工作的阶段划分

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96年到2005年为第一阶段，2005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一划分主要是为了相对清晰地描述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基本历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处于同一阶段内的论文都具有同质性，或处于同一讨论层次上。

1.第一阶段（1996-2005年）

此阶段的重点是对我国行政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性分析。除了张成福的论文，此阶段的主要成果还有：1998年，高小平发表了《行政学的“真知”在哪里》，这篇短论用一个设问揭示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本质（高小平，1998）；2001年，《中国行政管理》开设了研究方法专栏，希望以此“弥补中国行政学在研究方法论领域的不足，提供一个探讨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阵地”（张梦中、马克·霍哲，2001）。遗憾的是，此专栏未能延续下去，且其他参与者较少，显示出此阶段反思工作尚处“曲高和寡”的境地。

2004年11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联合召开了公共行政管理方法论创新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呼吁要“大力加强方法论研究，切实提高公共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郭济，2004：4），这为以后的讨论打下了基础。

2.第二阶段（2005年至今）

此阶段的反思工作开始转向对我国行政学研究进行量化评估。2005年，美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论文集的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怀特、亚当斯，2005）出版。此书出版后，其中的评估框架开始被许多学者运用于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与评估。2005年，董建新、白锐、梁茂春开始尝试运用定量技术来评估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董建新等，2005）。2006年，《中山大学学报》开设了“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专栏，在该专栏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马骏，2006)一文中，马骏第一次使用了“反思”这个词来概括对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讨论。2007年，何艳玲借鉴了怀特等人的研究框架，以1995-2005年间刊登于国内主要行政学期刊（也包括《中国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学报》）的论文为样本，设计了多个指标来检测我国行政学研究发展现状(何艳玲，2007a)。随后，陈辉扩大了董建新等人的学报样本，再一次对主流学报进行了评估（陈辉，2008）。

在这些量化评估的基础上，2007年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首届青年中国公共行政学者论坛：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学术研讨会。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开设了“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专栏。自此，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反思工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与此同时，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支持。比如，从2006-2007年，郭小聪、肖生福连续发表了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研究”所资助的3篇论文（郭小聪、肖生福，2006，2007a，2007b）。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立项。同年，《公共行政评论》开设了“行政学研究方法专栏”（费小冬，2008；王宁，2008；朱春奎，2008），在此专栏中，朱春奎的文章也第一次介绍了在新科学影响下的行政学研究新路径，展示了对我国行政学研究进行反思的新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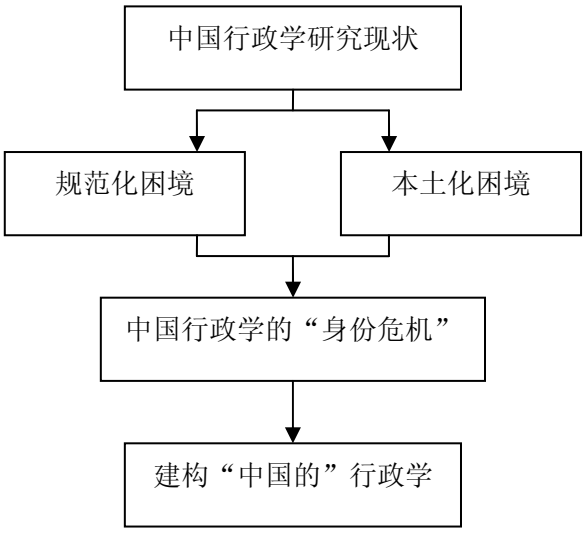
以上工作表明，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工作已经不再是“星星之火”，目前虽然还没有形成共同行动，但至少已经成为局部共识。

三、反思的焦点：规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困境

以上介绍了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基本文献，那么，这些文献讨论的焦点是什么呢？综合已有文献后发现，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起点是我国行政学研究的现状，发现的基本问题是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规范化困境与本土化困境，这一双重困境使我国行政学的发

展隐含着身份危机；因此，建立“中国的”行政学（即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标准的行政学）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将这些讨论归类，可以用一个简化的图形来描述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基本脉络(图2)。显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脉络。事实上，在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过程中，无论是聚焦方向还是具体讨论，反思者的观点都存在差异。

图2 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脉络



（一）本土化困境：行政学研究如何观照复杂的中国行政实践

严格来说，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工作始于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中国化）”而非“规范化”困境。早在反思之初，张成福即认为“就中国行政学科本身的发展而言，除非形成自己的理论——无论是巨型理论、中型理论，还是微观经验型理论——否则，中国行政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领域”(张成福，1996：59)。随即他又提出，行政学中国化，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行政理论。这篇论文的贡献不仅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行政学的中国化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我国行政学研究需要在巨型理论、中型理论、微观经验型理论方面形成自己的理论。但是该文并没有就中国行政学如何构建自己的巨型、中型、微观经验型理论提出看法；而后续的讨论者，除了麻宝斌、李广辉就行政学中型理论（中层理论）进行过专门论述（麻宝斌、李广辉，2005）且由何艳玲（2007a）予以呼应以外，其他讨论者似乎并未沿着这一路线走下去。因此直到现在，这一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答案。

在反思工作的第一阶段，乔耀章也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中国行政学“中国化”的论文（乔耀章，2003，2005，2007a，2007b）。他提出了一个有关我国行政学本土化的前提，即“要把西方的行政学，尤其是美国的行政学用我国第四次修改后的宪法把它加以过滤，把它置于

批判的文火上加以烘烤，把西方行政学尤其是美国行政学的气体蒸馏掉，逐步营造行政学的中国特色、中国学派”（乔耀章，2005：46）。

显然，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是在反思之初首先就遇到的问题。由于没有解决本土化问题，行政学研究回应行政实践的能力比较有限。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解决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困境必须回到行政学实践，“使行政学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郭小聪、肖生福，2006：151）；“行政学的‘真知’存在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存在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行政学者要去努力挖掘实践中的理论含量”（高小平，1998：15）；我们“要打破枷锁，解放自己，走出学府，走进政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奠定坚实的实证基础”（薄贵利，1998：7）。以上观点虽表述不一，但基本主张一致。

（二）规范化困境：行政学研究如何形成有质量的知识增长

虽然我国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最早受到人们关注，但此后行政学研究的规范化困境却受到了更多人关注。“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薄贵利，1998：5）应该说，在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反思工作的第一阶段，有关我国行政学研究规范化困境的讨论几乎都是通过描述分析来进行的，但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后，通过量化评估来解释这种规范化困境的存在则成为焦点。

2005年，董建新等人首先用数据证明了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性失衡，他们认为我国行政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几乎没有真正有效地运用实证的方法来检证自己的理论假设”（董建新等，2005：54）。2007年，何艳玲用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证明了类似的结果。规范化困境带来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质量与知识增长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实现了在数量上的超常规发展，但是总体质量却并不如人意”（郭小聪、肖生福，2007b：59）。

关于规范化困境的解决，目前已有的共识是：主流行政学期刊的导向；研究者的自律与自省；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训练；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开展集体协同研究（薄贵利，1998；徐君，2002；郭小聪、肖生福，2006）。

（三）行政学的身份危机：行政学研究如何获得外部认同

“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争论与反思，某些争论和反思甚至深刻到使得公共行政学面临可怕的身份危机”（马骏，2006：73）。同样，随着反思的深入，中国行

政学研究的身份危机也被提出。2002年后，袁达毅（2002）、刘亚平（2006）、马骏（2006）、何艳玲（2007b）、陈辉（2008），以及颜昌武、刘亚平（2007）等人相继用了“危机”这个词来概括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提出：“一个必须反思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是否得到国内学术界其他学科同行的认同，是否得到国外公共行政学同行的认同，是否得到国内公共行政实践者的认同?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种认同，那么，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一个应用领域来说，中国公共行政学都存在着严重的身份危机。”(马骏、刘亚平，2007：8）

四、反思中的分歧：行政学走出身份危机的路径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共行政学……真正的危机在于，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滞后制约或限制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刘亚平，2006：102）。基于该看法，众多研究者开始围绕行政学研究方法对其身份危机的解决进行讨论，并因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

（一）研究的起点：对策研究还是问题研究

争论的问题首先是，行政学研究是侧重对策研究还是问题研究？二者看起来并不矛盾，但却表明了我国行政学研究旨趣迥异的基本出发点。对策研究是“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其重点在于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问题研究是“基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其重点在于解释现实问题（当然这种解释往往会解决问题提供启示）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学是一门行动中的科学，是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董建新等，2005：54），要“面向中国的实际，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公共行政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公共行政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当前面临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对策与方案。这是我国公共行政学超越危机，走入科学发展道路的必然逻辑”（陈淑伟，2007：88）。

然而，在其成为一种基本主张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对对策研究进行了反思。“由于对策必须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它使得公共行政研究被实践者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牵引，在当代问题中跳来跳去，难以形成累积性的知识基础；引导研究者过于关注实务细节，而不能抽象思考现实问题，从而极大地伤害了研究指导实践的能力”（刘亚平，2008：71）。可以看出，对策研究的质疑者所担心的是，由于对策必须是具体细微的，因此行政学研究者随时会被具体问题牵制，无法抽离于现实，也难以累积知识。

如果不是对策研究，又应该是什么研究呢？有的研究者认为，答案是问题研究[①]。“行政学研究要寻求理论创新……必须以问题研究作为其现实支点，强化问题研究意识，增强问题研究能力，进而提升其理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芮国强，2008：59）因此，如果说行政学者的能力经常“受到质疑的话，那也是因为我们错误地界定了自己的任务。作为研究者和学者，我们能够为公共行政实践作出贡献的方式在于教育的层面，即帮助实践者更好地认知公共行政现实。”（刘亚平，2008：76）也就是说，行政学研究并非一定要直接指向实践问题的解决，如果将行政学研究定位在帮助实践者更好地理解其身处的现实上，则可能更好地指导公共行政的实践；而这一点，也正是行政学研究真正能做的贡献。

（二）研究的路径：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

对于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路径选择，是应该侧重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本来似乎并没有分歧。比如，薄贵利认为我国行政学“要改变研究方法，提倡实证研究”（薄贵利，1998：7）。董建新、何艳玲等人在数据评估的基础上也提出我国行政学研究应该大力加强实证研究的训练。马骏也持有同样观点，他认为解决问题的首要环节是进行有质量的实证研究（马骏，2006）。

虽然以上学者并没有表明实证研究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独尊”地位，但其主张却经常使人们误解。因此，后来陆续有学者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一个较健康的社会科学研究，应是包含了实证、诠释、批判等三种方法”（刘亚平，2006：104）[②]，“在保持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应引入哲学的形而上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方法，以提高公共行政方法研究的层面与视角”（何颖，2005：104）。马骏随后也提出我们“也许过多地强调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研究取向不重要。对于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来说，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同样是十分重要的”（马骏，2006：76）[③]。

---

① 芮国强的一篇文章详细回答了“问题”成为行政学研究对象要满足的条件：1.已有理论不能解释现有行政实践或者在其与现有行政实践之间出现了矛盾。2.问题研究有意义，问题研究需要有特定的目标指向和任务规定，确实有助于我们从不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不深到知之更多、更深，有助于行政改革与发展。3.该问题是有解的，在特定的情景中借助已有知识和理论经过努力能够加以解答。4.该问题的提出作为一种假设不能想当然，需要相应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5.对该问题的解答需要一定的努力和创造，问题研究不是经验总结，不是会议发言或简单的政策诠释，需要具备学理性。（芮国强，2008）

② 实证研究以演绎和归纳逻辑的科学分析思路为基础，关注的是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通过发展一套相互关联的并可以验证的法则来说明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达到解释、预测和控制自然和社会事件的目的。诠释使解释研究的结论有意义，而批判则决定新的结论是进一步证实还是推翻现有的理论。诠释研究帮助我们了解研究对象本身对自己行动所赋予的意义，从行动本身去理解人的行动，从事情发展的脉络和情境去理解个人的行动，从而还原人的主体性。批判研究则帮助我们认识到当前视角的局限性，通过展示隐含的预设，并对之进行批判，将实践者所模糊认识到的不恰当之处揭示出来，从而帮助他们看到事情真实的一面。批判研究质疑我们最基本的假设，并要求我们对假设做出评价，以作为行动的基础。诠释和批判研究通常可归为规范研究。(White，1986，1999；转引自马骏、刘亚平，2007)

③为了表明对于规范研究的重视，中山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公共行政学规范理论译丛”。此译丛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另外有一些学者则开始对实证研究本身做出批判，比如张康之就认为 ：“近些年来，一些人对西方实证科学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以为这种所谓科学方法具有纯科学的性质。其实，恰恰相反，即使实证方法具有了充分的工具理性特征，也是从属于工业社会的存在和治理这一整体需要的。而且，由于实证方法对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而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一方法在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消极性而盲目地加以顶礼膜拜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无知的表现。”随着批判的深入，他的观点也逐渐转到了另一个侧面，比如诠释性研究对于我国行政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于政府所面对的复杂社会系统而言，直觉的思维可能更具优势。甚至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直觉思维也是必要的。”（张康之，2006：18）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争论，可以发现这些立场本身并没有太大分歧，其真正分歧可能在于对规范研究的误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通常将所有非实证研究都当作规范研究。但事实上，这类研究多数并不符合规范研究的质量标准（何艳玲，2007）。对行政学研究来说，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符合一定学术标准、达到一定学术质量的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双重缺失”。换言之，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只要符合一定学术标准、达到一定学术质量，对我国行政学研究走出身份危机来说都同样重要。

（三）研究的技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实证研究技术层面，是应该注重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呢？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行政学研究在研究技术的运用上是“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袁达毅，2002：17）。在这一判断中，“定量分析少”似乎已成为共识，但是是否就“定性分析多”呢？事实上，正是在这个判断上，许多反思者开始争论。不过，正如在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上的分歧一样，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反思在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上的区别可能也并不是这些立场本身的差异，其真正的分歧在于对定性研究的误解（何艳玲，2007）。

定性研究，无论是生活史、案例研究、民族志还是扎根理论，在形成研究问题、理论化乃至数据收集上都有其自身特有的准则与特点。因此，问题的实质恐怕是，如果用定性研究的学术标准去评判，可能存在的将是一些处在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的模棱两可的研究。

（四）反思的深化：反思者在对话中的“再反思”

前面介绍了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分歧。虽然这些研究者仍然有不同立场，但是他们也在反思过程中开始对自己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同时慢慢融合、相互对话、相互借鉴，逐渐将反思工作本身推向深入。在此可以以两篇文献为例来说明这种“再反思”的过程。一篇是马骏（2006）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简称2006年文），一篇是马

骏、刘亚平（2007）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简称2007年文）。由于其作者在2007年文中特别标注此文是2006年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因此这两篇文章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将具有比较意义，我们也能因此而“窥探”到反思者在再反思过程中观点的转变。为了更清晰地看到这种转变，先将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列出如下：

表1 反思者的“再反思”

年份	问题1	问题2	问题3	问题4	问题5	问题6	问题7	问题8
2006年文	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	研究方法的“非规范化”	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	缺乏指导实践的能力				
2007年文	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	缺乏学术规范	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	缺乏指导实践的能力	规范理论的贫困	研究质量存在问题	“管理主义”盛行	消解了“历史”的公共行政研究

从表1看出，2007年文与2006年文相比，多了问题5、问题6、问题7、问题8等四点，对于这四个问题，尤其是问题5、问题7、问题8，作者都给以了详细论述：

问题5：规范理论的贫困。虽然经验研究非常重要，但规范理论同样重要。缺乏规范理论，将无法意识到行政实践与理论背后隐含的价值或更大的政治哲学，无法认识到现有经验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问题7：“管理主义”盛行。管理主义倾向将政治与行政“二分”推向极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一种或隐或现的技术主义或工程主义的研究取向。

问题8：消解了“历史”的公共行政研究。行政学研究严重忽视了对行政史的研究。缺乏历史意识的行政学研究，不仅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行政实践的过去，而且使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目前实践的历史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理性而冷静地审视不断涌入的西方行政学理论。

显然，与2006年文相比，2007年文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维度，尤其是管理主义导向、行政学研究的历史意识以及行政学规范理论，这些以往曾被忽略的问题都被给予了特别重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者在2007年文中加了一个注释，对另外两位研究者提出了感谢，而这两位被致谢人，恰好也是致力于行政学规范研究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这表明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者们不仅在持续反思我国行政学研究，而且也在相互对话过程中“再反思”了自身的反思工作。

五、结论：在反思中发展的中国行政学

以上总结了自1996年以来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的一些基本讨论，显然，这场讨论仍将继续。分歧仍然存在，但一些基本的东西已经逐渐清晰。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1.从1980年代重建以来，我国行政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无论在研究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目前我们仍然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但一门学科越发展，对发展本身的反思就越有必要。

2.尊重社会科学的一般学术规范是行政学研究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具体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的运用，只是一种基于不同学术训练、不同问题体验的选择。对于行政学研究来说，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合适的方法”。

3.作为学术研究的行政学研究本质上是问题研究。学术研究的主要呈现形式是学术论文。国家标准“VDC 001.81”、“CB 7713-87”号文给学术论文的定义为：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可见，行政学学术研究的核心要旨是对行政实践给以准确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生成”。当然，对行政实践的准确解释恰恰也是对策研究的重要基础，行政学者可以而且也应该去关注对一个实际的行政问题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但这是行政学者应有的公共情怀与应尽的社会责任。

4.我国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中国化）工作必须尽快提上日程。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不是强调一定要形成完全原创的、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行政学理论，而是强调要做到：与西方行政学概念、范畴与理论开展对话，但要找到它们在我国行政实践背景下的真实内涵以及可适用性；如果找不到现成的概念、范畴与理论，则有必要在大量的、有质量的研究基础上建构“中国的”概念、范畴与理论。在此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西方行政学概念、

范畴与理论所立足的前提不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预设，而需要在我国的背景下重新“清零”或者重新证明。

5.注重构建有历史意识的中国行政学研究[①]。对西方（美国以及美国之外）行政学说史梳理已经迫在眉睫，尤其要改变将西方行政学等同于美国行政学的误区，对欧陆行政法传统的非美国行政学予以必要关注（和经纬、吴逊，2008）。同时要特别注意对中国（古代）行政学说史的梳理也非常有限。思想史的梳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个行政学发展的整体图景，而且可以将一些争论与分歧正本清源以保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对话平台。

6.要关注“新科学”对行政学研究的影响。20 世纪中期以来，“新科学”如混沌理论、量子理论等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公共行政学必将在新科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面貌。在我国行政学研究的未来发展中，需要更加重视新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展，并探讨在新科学影响下我国行政学研究的领域与范式。

7.公共性应该成为全体行政学研究者的一个准则。“今天中国的公共行政，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盛行一种‘管理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诸如‘人类幸福’、‘美好生活’等规范性的价值问题则被远远地抛在了一边，少人问津。”（颜昌武、刘云东，2008：167）从长远来看，行政学研究公共性的匮乏，不仅将伤害到整个学科发展，也会对实践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8.进一步倡导全体行政学研究者的学术自律。这种自律不仅体现在对学术规范的尊重，也体现在对他人学术成果的尊重，还体现在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职业操守的恪守。

9.最后，从现阶段可操作的层面来说，我们需要大量累积指向真实实践的行政学经验研究（何艳玲，2009）。指向真实实践的行政学首先不是指行政学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性，而是指行政学研究对象应该指向在既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动者（包括行政组织及与其互动的市场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的实际行动。行政学研究指向真实实践，我们才可以累积从中央政府到乡镇政权（以及各职能部门）“真实运作”的微观认知，在此基础上解析我国行政学实践中隐藏在各种矛盾和悖论背后的隐密世界；然后，才可以据此建构各种“中国化”的理论解释。

学科的进步来自于不断反思。关于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不会也不应该结束；或者说，反思与再反思正是我国行政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从现在开始，在坚定的外部借鉴与激情的自我反思之后，我国行政学研究应该而且必将进入另一个阶段，即本土化理论构建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是一个漫长但充满惊喜的过程！

[①] 这一点看法受启发于与马骏教授的交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薄贵利（1998）.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中国行政管理，12:4-7.
陈辉(2008).我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公共管理研究(第六卷)：181-19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陈淑伟（2007）.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危机：概念矛盾与研究困境.兰州学刊，6:86-88.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董建新、白锐、梁茂春(2005).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50-55.
费小冬（2008）.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要素、研究程序和评判标准.公共行政评论，3：23-43.
高小平(1998).行政学的“真知”在哪里.行政论坛，6:14-15.
郭济(2004).大力加强方法论研究，切实提高公共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中国行政管理,12:4-6.
郭小聪、肖生福(2006).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困境与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6：147-152.
郭小聪、肖生福(2007a).中西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比较分析.江西社会科学,1：158-164.
郭小聪、肖生福(2007b).中国行政学学科建设：科学化和中国化.中山大学学报，3：60-66.
和经纬、吴逊(2008).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变与本土观照：对中美两国大学公共行政导论课程教学提纲的经验研究.公共行政评论,6:167-183.
何艳玲（2007a）.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我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政治学研究，1:93-104.
何艳玲(2007b).危机与重建：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进一步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4:12-15.
何艳玲(2009).指向真实实践的中国行政学研究：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中国行政管理，8：14-18.
何颖(2005).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及其走向评析.中国行政管理,10:104-108.
怀特、亚当斯编(2005).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刘亚平(2006).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方法论径路.武汉大学学报，1：102-106.
刘亚平(2008).公共行政中的对策研究：批判与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71-78.
麻宝斌、李广辉(2005).行政学中层研究——寻找理论与现实的中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17-21.
马骏(2006).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中山大学学报，5：73-76.
马骏、刘亚平(2007).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4：8-12.
乔耀章(2003).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哲学思考.中国行政管理，8:20-21.
乔耀章(2005).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学科发展与方法体系.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45-49.
乔耀章(2007a).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发展观辨析.长白学刊，2：49-51.
乔耀章(2007b).行政学美国化：理论支点及其引发的批评与启示.湘潭大学学报，5：41-47.
芮国强(2008).问题研究：行政理论创新的实践起点.学术界，4：58-64.
王宁（2008）.个案研究中的样本属性与外推逻辑.公共行政评论，3：44-54.
徐君(2002).跨学科研究：加快我国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新视野，6：61-62.
颜昌武、刘亚平(2007).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武汉大学学报，6：921-927.
颜昌武、刘云东(2008).西蒙－瓦尔多之争：回顾与评论.公共行政评论，2:144-170.
袁达毅(2002).中国行政学的危机与出路.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17-19.
张成福（1996）.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政治学研究，1:57-62.
张梦中、马克·霍哲(2001).“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总序.中国行政管理，8:40-41.
张康之(2006).论行政学研究中的学术自觉.理论与改革，3:15-20.
朱春奎（2008）.公共行政学的新范式——混沌理论.公共行政评论，3：72-88.
White, J. D.(1986).On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tration Review*, 146(1): 15 - 24.
White, J. D.(1999).*Taking Language Seriously: The Narrative Foundation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A Review on the Reflections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1996-2008

Yanling He

Abstract A general consensus on reflecting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is that,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s of loc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during its rapid development as a discipline. An identity crisis to some extent hidden in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in China is implied by such dual-plights. It is becoming an imminent and pressing task to establish a kin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iz*. a discipline combining Chinese style, Chinese manner, and Chinese standard. On the issue of how to ravel out the identity crisis, existing reflection works present a series of divergences upon the alternative adoptions of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or issue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or non-empirical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light of the status in quo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the accumul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administration studies pointing to *de facto*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and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Reflections, Review